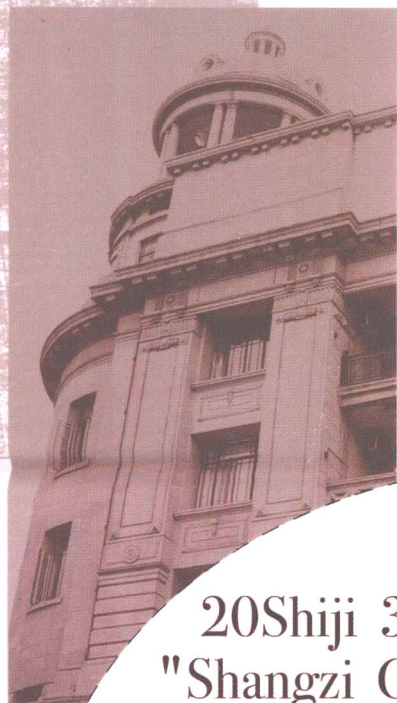




20Shiji 30Niandai Zhongguo
"Shangzi Guinong" Wenti Yanjiu

20世纪30年代中国 “商资归农”问题研究

许永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Shiji 30Niandai Zhongguo
"Shangzi Guinong" Wenti Yanjiu

20世纪30年代中国 “商资归农”问题研究

许永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商资归农”问题研究 / 许永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61 - 1024 - 9

I. ①2… II. ①许… III. ①农村—合作金融—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F832. 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55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山西大同大学资助出版

序

呈现在面前的这部书稿是许永峰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提炼、补充、修改而完成的。永峰博士曾于2004—2007年间随我在山西师范大学攻读专门史硕士学位，其论文选题就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问题。2007年硕士毕业后又考取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仍由我担当授业导师，2010年夏顺利毕业。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毕业，其间历时6年，她离开年幼的孩子以及眷恋的丈夫与家人，奔走于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书店乃至古旧图书市场之间，白天搜集资料，或复印或抄写或购书或“淘宝”，晚上在电脑前工作直至深夜。作为一个女同志，做到这点是十分不易的。如今，这部凝聚其数载心血的书稿即将付梓刊行，我作为指导教师感到无比兴奋。

实际上，我对中国近现代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亦是近十年来之事，在许多问题或现象上的看法难免“失当”或“浅陋”。不过，因受永峰博士多次请托，还是想借此阐发几点“不成熟”的认识。

第一，“商资归农”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从现在出发来理解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理解现在”，这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亦徒劳无功。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占主体人口的大国，农村问题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牵涉国家经济振兴、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在有关农村的诸多问题中，农民的组织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永峰博士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资归农”问题，亦即都市

商业银行探索参与组织农民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无疑敏妙地把握了当下学术研究发展的动脉。

在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历史时期，对于中国都市银行界来说，农村几乎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甚至时至今日许多银行亦对其“敬而远之”。这主要是因为投资农村的风险、成本与利益不相匹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是农村金融的基本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金城、中国等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都市商业银行依托当时的农村合作运动开展了一场“资金归农”活动，这场活动存续时间仅有数年，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新鲜事物”。其尽管是在当时中国农村“金融贫血”和都市“金融充血”的特殊背景下发生，但银行家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社会意识可嘉可赞。这场活动显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在实践运作中，各大银行均进行了充分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如采取合作社放款、抵押贷款所放款、农仓放款等多种放款方式，而对合作社的放款形式亦不少——或由银行与合作社指导机关搭成合放，或由银行与合作社指导机关分工合作、各负其责，或由指导机关居中介绍而由银行与合作社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并插手合作社指导与组织，或不经指导机关而由银行直接贷款予合作社并直接指导与组织合作社；既单独放款又与同业银行组团放款，既对人信用又对物信用；采取差别贷款利率，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等等。其中许多经验至今不乏借鉴意义。此外，诸如关于农贷系统性风险问题尤其是农贷制度环境、政府参与农贷角色等问题，均可为当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启示。

第二，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生命所在，缺乏证据做支撑的研究实际等于无水之鱼。丰富而信实的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永峰博士的研究就是建立在数百种参考文献和大量统计资料基础上的，如文中仅数字统计表就有70余个，而且这些数据表是经过其重新整合或多方考证形成的，某些原始材料中存在的谬误都得到了修正；尤其是许多时候作者还在注释中列举了其他相关数据和资料，以为参考或对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严谨治学态度的最好体现。

第三，从研究思路观之，永峰博士一面将“商资归农”问题作为中国农村合作制度及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环节来考察，对其在制度纵向变迁中的地位予以准确定位；一面将“商资归农”问题与当时

各种外在环境因素进行横向联结，运用多学科理论对其命运进行维度性剖析。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对“商资归农”问题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深刻见解，如 20 世纪 30 年代“商资归农”与当时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及危机息息相关，其两难命运主要源于农贷系统性风险——如市场风险和自然、社会、制度等环境风险，其短命则主要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化与国家化导致；商业银行与农村可以共存共荣，政府不应承担全部农贷任务，但有责任为“商资归农”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但要以本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制度创新的基础；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要以满足农民利益及农业发展需求为目的，不能成为政府实现非经济目的的工具，等等。

总之，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一个具有持久学术魅力的研究课题，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政治课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在中国改革开放若干年后，“三农”问题如今又成为困惑中国前行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或政治问题，历史学者有责任有必要从历史当中为其寻求启示。换言之，永峰博士的努力是“与时俱进”的，我赞同她的选择，认同她的研究，尽管其目前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只要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值得肯定的。我希望她沿着自己的道路并持有坚定的信念走下去！

是以为序！

岳谦厚

2012 年 3 月 28 日于太原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农村危机之深化与农村 合作运动之新趋向

第一章 1930 年之前的合作运动	(17)
第一节 20 年代初期:合作思潮传播与早期合作社实践	(17)
第二节 1923—1930 年:华洋义赈会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验	(25)
第二章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农村危机之深化	(35)
第一节 农村危机之一般特征	(35)
第二节 农村之“贫血症”	(37)
第三章 救治农村的路径选择与农村合作运动发展之新趋向	(55)
第一节 “合作运动:救治农村的良方”	(55)
第二节 农村合作运动之新趋向	(65)

第二编 “商资归农”之实践

第一章 都市的“充血症”	(75)
--------------------	------

第一节 都市银行业的“繁荣”	(75)
第二节 潜伏的危机:资金呆滞、收益萎缩与非生产性投资 “偏好”	(85)
第三节 银行业投资视线之转移	(96)
第二章 “商资归农”的实践过程	(100)
第一节 “商资归农”之“三巨头”:上海、金城、中国	(100)
第二节 商业银行之联合放款:从组织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 团到参加农本局	(121)
第三章 “商资归农”的实践特点及绩效	(126)
第一节 投资数额	(126)
第二节 投资区域	(131)
第三节 投资方式	(136)
第四节 信用方式、贷款期限、手续及利率等	(140)
第五节 特征概述及绩效总评	(142)

第三编 关于“商资归农”问题之讨论

第一章 福耶? 祸耶?

——关于“商资归农”的三派之争

第一节 否定派	(151)
第二节 肯定派	(162)
第三节 中间派	(165)

第二章 两难困境:关于“商资归农”问题讨论的若干焦点

第三章 探索出路:关于政府统制商业银行农贷及建立 合作金融系统之议

——以 1935 年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为中心

第一节 关于政府统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贷款问题的讨论	(182)
---------------------------------	-------

第二节 关于建立合作金融系统问题的讨论	(186)
---------------------------	-------

第四编 “商资归农”终结与国民政府 农村合作金融系统之建立

第一章 农本局的设立与“商资归农”活动的结束	(199)
第一节 农本局的成立	(199)
第二节 农本局业务开展及“商资归农”的结束	(202)
第二章 统一农业金融制度的建立：中国农民银行统一农贷	(205)
第一节 抗战之前中国农民银行的初步发展	(205)
第二节 抗战期间农业金融制度的演进及统一农业金融 制度的最终形成	(207)
第三章 合作金融系统的基本形成：各级合作金库的设立	(221)
第一节 《合作金库规程》颁布与地方合作金库的发展 及其困境	(221)
第二节 《合作金库条例》颁布与全国合作金库纲的基本 完成	(225)
第三节 中央合作金库与中国农民银行的业务划分	(229)

第五编 “商资归农”命运之透视

第一章 “商资归农”之两难：农贷系统性风险考析	(233)
第一节 世界经济危机与市场风险倍增	(234)
第二节 环境风险	(250)
第二章 “商资归农”之“昙花一现”：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化国家化 原因探析	(260)
第一节 世界各国商业银行农贷与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及其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一) 现实关怀

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是笔者选择这一历史研究课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浩瀚的市场大潮中,分散的小农极易被市场巨浪所吞噬。同时,资金问题无疑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组织农民、如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有这样两个突出特征。

其一,农业合作社是一种极重要的经济组织。美国、日本、丹麦农民参与组织的比例均为100%,法国、德国均在80%以上,^①合作社是其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组织形式,美国的“新一代合作社”、日本的农业协会都是成功的典范。可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农业越发达的国家,农民组织化程度也越高,合作经济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支柱之一。

其二,许多国家农村金融主体都实行多元化,商业银行是其中的一元。如美国的农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政府农贷机构、政策性农村金融和保险机构。墨西哥的农业金融机构包括国家农业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家外贸银行、全国金融公司及农业保险机构。印度的农业金融机构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商业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地区农村银行、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农村开发银行及存款保险和

^① 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信贷保险公司。^① 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在充实农村金融力量,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我国现状来看, 也有两个明显特征。

其一,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市场化, 农村商业领域中各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在增强农业吸引力、稳定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有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国际化等方面的经济功能, 及维护农民政治权益、沟通农户与政府、挖掘农村草根精英等方面的政治功能均已明显显现。^② 然而, 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非常有限, 到 2000 年前后参加各种农民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 3.5%。^③

其二, 农村合作经济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受制于诸多因素, 特别是资金因素。虽然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等融资组织或机构, 但大都未能有效发挥支农作用。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 其农贷数额占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农贷总额的 78%, 但是其从农户吸收的储蓄存款额却大大超过对农户的贷款额, 而且两者差额有扩大趋势, 1990 年为 1324 亿元, 1997 年扩大到 7389 亿元。可见, 农村信用社从农民那里吸收来的资金大多未用于农业和农村, 而是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 农村信用社离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还相去甚远。1983 年开始出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民间金融互助组织, 以小额信贷在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曾发挥过有益作用, 但在发展运作过程中, 某些基金会因种种原因曾酿成金融诈骗和挤兑风潮等恶性事件, 1999 年国务院发文在全国范围予以统一取缔。^④ 此后, 一些基金会转入地下。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被称为“收购银行”, 在农贷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农业银行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 从农村地区撤并了 3 万家以上机构网点, 留下者也只是农村金融的“虹吸器”而已。目前, 农户借贷困难仍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据调查, 2002 年农户借款来源中, 银行及信用社贷款占 26.1%, 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 0.5%, 私人借款占

① 黎和贵:《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及经验借鉴》,《国际金融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② 朱国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江海学刊》2005 年第 6 期。

③ 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 页。

④ 王贵辰:《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4—577 页。

71.8%，其他占1.6%，^①可见，民间私人借贷仍是农户借贷的主要渠道。有学者估计，民间借贷资金中高利贷至少占60%以上。^②而据笔者对家乡所在的晋北农村的了解，农户融资多来源于亲戚朋友，或为无息借款，或按银行存款利率计息，均为信用借款；绝大多数农民从来就没想过可以从信用社或农行借款，更不知怎么去借，只知那是存取款的地方。

总的来看，中国农业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农村资金外流、农村金融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亦相当严重。

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一直以来对农村所怀有的那份特殊感情，早在数年前笔者就把研究视线锁定于近代农村问题，在翻阅资料特别是《大公报》、《申报》等民国报刊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那场空前的农村危机（农村资金外流、农村金融枯竭是其主要特征）以及社会各界提出的种种救治方案不时吸引着笔者的目光。在各种方案中，农村合作运动因备受社会及政府青睐而得到迅速发展，曾引起笔者高度关注，特别是当了解到商业银行作为非农业性质亦非合作性质的金融机关而能从事农村（合作）贷款，并成为抗战前推动农村合作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时，不禁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而萌生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想法，希望其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二）学术追求

从学术角度看，对20世纪30年代的“商资归农”问题进行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其一，研究“商资归农”本身的意义。“商资归农”活动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生事物，是商业银行参与组织农民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在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期是民国农村合作运动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是当时农村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前所谓“黄金十年”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纵向看，这一时期既是农村合

①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624页。

② 万安培：《整治民间高利贷需要转变思路》，《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③ 张培刚：《中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经济评论》1936年第3卷第3期。

作运动由多元主体推动而迅速发展的“极盛时期”，亦是“质”与“量”不能协同并进的危机四伏的“关键时期”。商业银行是多元推动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元，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与危机都与其有着密切关系。故研究“商资归农”对于深化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在近代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方面。20 世纪上半期，农户融资渠道既有典当、钱庄、合会、私人高利贷等传统形式，亦有银行等新式机构，商业银行作为农户的一种新式融资渠道，对之进行研究可以丰富近代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

其四，在近代银行业研究方面。华商银行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代表之一，“资金归农”作为其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一项新活动，对之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近代商业银行营业状况、方式乃至银行性质的进一步认识，对近代银行史研究亦具有一定意义。

二 学术史清理

如上所述，“商资归农”活动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新生事物，商业银行是当时农村合作运动的一个重要推动主体，是农户的一种新式融资渠道，“资金归农”是商业银行的一项新业务，因此，下面就从“商资归农”的专门研究、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近代农村（农业）金融问题研究以及近代银行业研究等四个方面来回顾“商资归农”的相关学术史。

（一）“商资归农”的专门研究

在“商资归农”开展期间尤其是 1934—1936 年间，曾发表过一些专论文章。如：符志逵的《商业银行对于农村放款问题》，王益滔的《论商业银行之农村放款》，章元善的《商资与合作》，慕桀的《新币制策动的银行农村投资》，李紫翔的《资金集中都市与“资金回到农村”》，李龙门的《对于陕西合作事业之商榷：商资流入农村的大问题》，李桢的《论商资流入农村——并答李龙门先生》，新在的《商业银行农村投资之利弊》，韦东的《论农村投资》^①。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商资归农”问题最受关

^① 分别载于《东方杂志》第 32 卷 22 号，1935 年；《中华农学会报》第 154 期，1936 年；《大公报》1935 年 5 月 12 日；《申报》1937 年 3 月 22 日；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107—109 页；《大公报》1935 年 3 月 4、5、7、8 日；《大公报》1935 年 3 月 16 日；《申报》1935 年 8 月 19 日；《申报》1935 年 3 月 4 日。

注、相关研究最集中的时期。但是,论者除“中国农村派”外,多数为合作界人士,他们对该项活动的认识难免受时代及立场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约半个世纪中,这一问题基本没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直到近十年来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个案研究有薛念文的《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追记》^①,诸静的《金城银行参加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活动述评》^②;区域研究有刘纪荣的《论近代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商资归农”——以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③;宏观研究有刘永祥的《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资金归农”活动评述》^④及兰日旭的《20世纪20、30年代商业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对农村放款的效应探析》^⑤等。这些成果主要对该项活动的背景、概况和成效或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受篇幅所限,叙述较为粗略、评价较为笼统。特别是对这场活动的具体运作特点、引起的社会反响、在民国农村合作制度及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两难命运及其根源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 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为服务于农村合作运动实践或适应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求,当时就有一批相关著作问世。或阐述合作原理^⑥,或介绍中国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与现状^⑦,或将阐发合作原理与记述中国合作运动实况相结合^⑧。报纸、刊物亦时常登载一些相关文章^⑨。这些著作或文章中,大多会涉及“商资归

① 《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上海金融》2001年第7期。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

④ 《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3期。

⑤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3期。

⑥ 于永滋:《信用合作经营》,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1948年印行。

⑦ 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行政院新闻局编:《中国合作事业》,编者1948年印;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编:《浙江省合作事业概况》,编者1941年印。

⑧ 唐启宇:《合作概论》,上海民智出版社1930年版;侯哲荇:《农村合作》,黎明书局1937年版。

⑨ 以《大公报》为例,如吴华宝:《中国之农业合作》,1936年4月22日;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1934年5月16、23日;叶谦吉:《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的组织问题》,1935年7月31日;[英]施克兰:《视察陕冀鄂三省合作社后之感想》,谷源田译,1934年12月12日;[英]甘博尔:《考察浙江合作事业后之印象》,1936年4月29日。

农”活动，但一般仅限于对事实的简单陈述。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起步。

就论文而言，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有詹玉荣、姜枫、张士杰、周为号、范崇山、卜国群等人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①，基本是对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宏观研究或是对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初步考察了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过程、社会效用。在评价方面多侧重于谴责，认为其是失败的，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或国民政府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基本沿用了 30 年代“中国农村派”的观点。在詹玉荣、张士杰的文章中，也提及商业银行的农贷，但叙述均非常简略，对其亦持否定态度。

90 年代中期特别是 2000 年后，成果可喜。主要有冯开文、高璐、张士杰、傅宏、梅德平、廖建林、刘椿、潘劲、李玉敏等对民国农村合作运动或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②，毛传清、赵泉民等对早期合作思潮传播的研究^③，赵泉民、张士杰、邱志强等对人物合作思想或实践

① 詹玉荣：《旧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简史及其社会效用分析》，《农村经济问题》1986 年第 10 期；姜枫：《抗战前国民党的农村合作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张士杰：《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国档案》1992 年第 4 期；周为号：《试论抗战前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5 期；范崇山、周为号：《抗战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考察》，《学海》1993 年第 3 期；卜国群：《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② 冯开文：《建国前农村合作组织低效率的原因探讨》，《古今农业》1998 年第 3 期；高璐：《析国民党农村合作运动》，《安徽史学》1999 年第 3 期；张士杰：《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和理论阐释》，《民国档案》2000 年第 1 期；傅宏：《论 1927—1936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傅宏：《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合作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梅德平：《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 年第 2 期；廖建林：《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及其实施成效》，《江汉论坛》2005 年 3 月；刘椿：《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潘劲：《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评价》，《中国农村观察》2002 年第 2 期；李玉敏、栾雪飞：《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李玉敏：《民国乡村合作社研究》，《北方论丛》2005 年第 6 期。

③ 毛传清：《论五四前后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6 期；赵泉民：《“主义”话语与 20 世纪中国合作经济思潮的兴起》，《东方论坛》2005 年第 1 期。

的个案研究^①，咎金生、魏本权、忻平和赵泉民、王科等对区域合作运动的研究^②，薛毅、刘招成、蔡勤禹等对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③，徐畅对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合作运动的比较研究^④，蒋慕东对合作立法、王丽娜对合作教育、刘纪荣对合作医疗、魏本权对合作农场、徐畅对棉花产销合作社的研究^⑤等等。这些论文在研究领域上进一步拓展，在分析评价方面亦出现了新的趋向，如对“农村合作运动成败”进行重新思考，对合作运动绩效不足的归因更加具体、多维、深刻，新制度经济学、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得到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上述研究对“商资归农”问题很少关注。国外陈意新的论文^⑥，研究内容也没有超出上述范围。

80年代之后的相关著作主要有5部。台湾学者陈岩松的《中华合作

① 赵泉民：《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张士杰、冯泓：《陈果夫的合作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张士杰、郭海儒：《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邱志强：《对梁漱溟乡村合作思想的反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咎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魏本权：《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以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忻平、赵泉民：《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赵泉民、忻平：《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科：《体系与效果的辨证——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乡村合作运动运作效果考析》，《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王科：《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天府新论》2007年第4期。

③ 薛毅：《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期；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蔡勤禹、侯德彤：《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试验》，《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

④ 徐畅：《1927—1949年国共两党农村合作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

⑤ 蒋慕东、张芳：《民国合作社法之演进》，《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王丽娜：《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级合作教育述评》，《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刘纪荣、王先明：《二十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魏本权：《合作农场：近代中国农业经营模式变迁管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徐畅：《抗战前中国棉花产销合作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美] 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